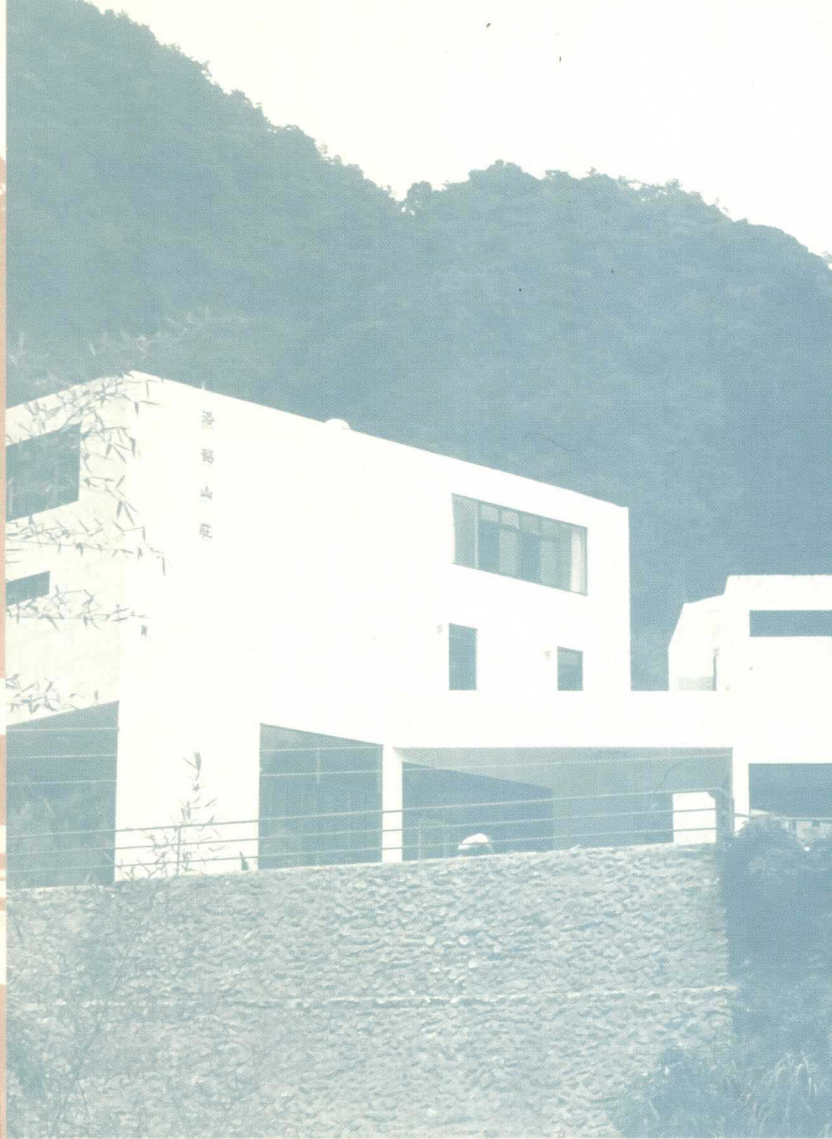


漢寶德

作品系列



汉宝德 著

筑人间

汉宝德回忆录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筑人间

汉宝德回忆录

汉宝德 著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15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简体中文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本书由台湾远见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授权。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筑人间：汉宝德回忆录 / 汉宝德著.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6
(汉宝德作品系列)
ISBN 978-7-108-05235-3

I. ①筑… II. ①汉… III. ①汉宝德 (1934~2014) —回忆录
IV. ① K826.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07891 号

责任编辑 张静芳

装帧设计 蔡立国

责任印制 郝德华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制 作 北京金舵手世纪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15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9.75

字 数 140 千字 图 80 幅

印 数 0,001—7,000 册

定 价 42.00 元

(印装查询：01064002715；邮购查询：01084010542)

三联版序

很高兴北京的三联书店决定要出版我的“作品系列”。按照编辑的计划，这个系列共包括了我过去四十多年间出版的十二本书。由于大陆的读者对我没有多少认识，所以她希望我在卷首写几句话，交代一些基本的资料。

我是一个喜欢写文章的建筑专业者与建筑学教授。说明事理与传播观念是我的兴趣所在，但文章不是我的专业。在过去半个世纪间，我以各种方式发表观点，有专书，也有报章、杂志的专栏，副刊的专题；出版了不少书，可是自己也弄不清楚有多少本。在大陆出版的简体版，有些我连封面都没有看到，也没有十分介意。今天忽然有著名的出版社提出成套的出版计划，使我反省过去，未免太没有介意自己的写作了。

我虽称不上文人，却是关心社会的文化人，我的写作就是说明我对建筑及文化上的个人观点；而在这方面，我是很自豪的。因为在问题的思考上，我不会人云亦云，如果没有自己的观点，通常我不会落笔。

此次所选的十二本书，可以分为三类。前面的三本，属于学术性的著作，大抵都是读古人书得到的一些启发，再整理成篇，希望得到学术界的承认的。中间的六本属于传播性的著作，对象是关心建筑的一般知识分子与社会大众。我的写作生涯，大部分时间投入这一类著

作中，在这里选出的是比较接近建筑专业的部分。最后的三本，除一本自传外，分别选了我自公职退休前后的两大兴趣所投注的文集。在退休前，我的休闲生活是古文物的品赏与收藏，退休后，则专注于国民美感素养的培育。这两类都出版了若干本专书。此处所选为其中较落实于生活的选集，有相当的代表性。不用说，这一类的读者是与建筑专业全无相关的。

这三类著作可以说明我一生努力的三个阶段。开始时是自学术的研究中掌握建筑与文化的关系；第二步是希望打破建筑专业的象牙塔，使建筑家为大众服务；第三步是希望提高一般民众的美感素养，使建筑专业者的价值观与社会大众的文化品味相契合。

感谢张静芳小姐的大力推动，解决了种种难题。希望这套书可以顺利出版，为大陆聪明的读者们所接受。

漢寶德

2013年4月

自序（初版）

1999 年底，我决定退休，离开台南艺术学院校长的职位。报上披露后，高希均兄就约我写传记。对于他的邀约，我一方面感激，一方面也感到不知所措。天下文化出版社出版不少名人传记，多是政治界、企业界大佬的自述，所以每有新书则洛阳纸贵。我这样的读书人，因缘际会，几十年间为社会做了点小事，值得出什么传记吗？高兄一再鼓励我，并送我几本文化界前辈的传记为参考，我就半推半就地答应了。

天下文化出版的传记大多是由专家执笔的。高兄认为我是写文章的人，最好由我自己执笔。其实我也很想请一位健笔为我的一生增添些颜色，可是这鸡毛蒜皮的一生，要我麻烦别人一五一十地听我说故事，实在不好意思，所以也就点头答应了。

我原是下笔很快的人，自己写自己，应该痛快淋漓才是。但是开始动笔，就觉得笔涩。这样一个文化人的自传要怎么写，才能使人感到值得一读呢？我请教一位喜欢读书的朋友，他建议我向细处写，向心里挖，写成一本文学作品。这是大文学家的手法，我做不到。又请教一位年轻朋友，他建议我写得轻松些，活泼些，多一点故事性，可以吸引年轻的读者。然而我的一生虽因世变而略有波折，实在是很平

凡的，除非编造，实在没有故事可言。我当然不能编一本自传。

当然，如果向细处写，写出我所体会到的人生的真实故事，也可以写得较有可读性；可是出一本十万字左右的自传，似乎做不到这一点。我参考已出版的传记，为时代留下印记的意义，超过讨好读者的意义，就使我收心，准备写一本流水账了。

即使是流水账，仍然少不了一些顾忌。自传免不了要写一些人与事，涉及别人，就免不了褒贬。而这些人大部分仍然在世，如果振笔直书，会伤害到别人，引起些争论，我这才体会到自传应该身后发表的道理。只为这一点，流水账就不能记得太清楚，下笔时不但要谨慎，而且要不断删减，减到枯燥无味为止。

写到事，也有难题。我一生所做的几件事，虽谈不上什么事功，可是既然写传，应该自我肯定一番，否则有什么看头？然而自我标榜实在不是我的个性。有时候不得不表白一番，却又怕读者们认为我自我膨胀。左顾右盼，下笔就没有那么流畅了。

所以花了几个月，初稿完成，连我自己读来都觉得无味。掷笔之后，又压了几个月才送给天下文化的林荫庭小姐，请她先行校阅，并提供我一些改进的意见。她很客气，只提出章节的问题。但是我可以看出来，她很了解我下笔时的难处，也觉得文字平铺直叙，太过平淡，尤其未能点出我在各领域的“影响力”。因此她主张找有力人士写序，为我揄扬一番。可惜这恰恰是我不愿意做的事情。

可是作为一个作者，我又不能不问写这本书的意义何在，希望读者从中得到些什么？自传是要读者认识我，他们为什么要认识我？思之再三，觉得我一生做事的“痴、呆”精神，也许可以供读者们参考。

读者们自拙著中可以感觉到，我做事的态度是很痴的。痴就是执著，

长于自我反省。我并不是聪明人，遇事反应很慢。我的长处就是把事情做到底，不完成绝不罢休。我总设定一个高目标，努力以赴，遇到问题，耐心地解决，可是不轻易降低标准，因此每件事总要花上十几年的时间。同时期的朋友，已经三级跳，几年间事业大有成就；也有些朋友都做了高官了，我还在原地慢慢地磨。我既没有过人的才能，只靠这个“磨”字，磨出一点成绩来。

我是一个山东乡下孩子，逢世变逃难到城里，与城里的孩子比，是个十足的呆子，不但不懂得人情世故，连一句讨人喜欢的话都不会说。既害羞，脑筋又转不过来，只会听老师、长辈们教的做人做事的道理，呆呆地埋头用功。我一生中并没有求过一件工作，居然为前辈们大力提携，也许是因为他们喜欢我这个呆劲吧！

在这里我举一个小故事说明我的呆劲。在成功大学念书的第一学期，体育不及格，金长铭教授听到后，帮我求情也被拒绝。我从来不喜欢运动，体育老师如此严厉，这又是必修课，使我感到严重挫折。我曾考虑借机退学了事，可是想想这一点阻碍都不能过关是没有出息的，就去与老师商量如何才能及格。他宽容我，只要选一项运动，够标准就可以了。我选了一项比较不会惹起同学注意的双杠，每天清晨早起去练习。在学期中，发现了肺病，医生嘱不可运动，可是我不愿向老师求情，为了过关，我仍然不断练习，一直做到学期结束。老师检验成绩，给了七十分，可是我的肺病已很严重了。后来听到这个故事的人，无不说我呆瓜。

我要感谢高希均兄与王力行女士的鼓励，否则我是不敢把这点痴、呆功夫呈现出来的。出版社的林荫庭小姐与吴佩颖先生对于文稿的修改与照片的选择帮了很大的忙。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出自传，记忆力又

不好，所以常遇到一些小空白，有劳朋友们帮我找回记忆。几经搬迁，老相片都遗失了，父亲为我找出几张，并为我画出老家的地图，说了些老故事，否则第一章就写不出来了。我的妻子，孙宁瑜女士的精神支助，是我能勉强缴卷的主要动力。

汉宝德

2001年7月

自序（增订版）

有一天，高希均兄笑着告诉我，《筑人间》已经出版超过十年了，应该有个续编本了吧！我也笑笑，觉得是他说客气话。没想到出版社的同仁真的就向我催稿了。

老实说，我真不觉得我的回忆录有续编的价值。

在 2000 年自公职退休之前，因缘际会为社会做了几件事，勉强值得写下来供年轻的朋友们参考。可是退休之后，除了在世界宗教博物馆馆长任上做了一点具体的事情外，其实乏善可陈，忽忽间就进入衰老之年。回顾这十年来的生命，真有增编的价值，值得劳动读者的法眼去阅读吗？

当然了，这十几年我确实没有真闲着。我是闲不住的。一方面，我一直在为报章、杂志写文章。到了 21 世纪，报上的专栏停止了，但是在杂志上与报纸副刊上仍然可以自由地发表一些短文。谢谢各位主编，使我仍然可以有机会发表一些感怀，或有系统地写系列性的文章。同时我也很感激几个出版社的朋友不嫌弃我，为我结集出了几本书，尤其是以美感为主题的文章。

如果我把这十年来的生命下一定义，可以称之为“谈美”的岁月。我曾希望退休后过有情的生活，我所指的“情”就是美感吧！对于全

民美育，我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可以说是我的信仰，也可以说我以此销蚀我的生命。“谈美”原是朱光潜的书名，我出书时借用，想起来实在太有趣了。“美”，是无法实践的，因此大家都喜欢“谈”，不谈又觉得对不起自己，对不起社会。一切努力也只是谈谈而已。

我谈美是不同于以诗文为背景的美学专家的。

我体会到全民美育的重要性是自建筑专业的服务观念开始。一个以美为目的的专业却为美盲的大众服务，是一种浪费。自此我看到文明国家，国民文化素养的基础其实是美感素养。而美并不是空谈、玄谈，是一种科学。可惜美育涉及国民，与政府的任务有关。我只能空谈，实因不在其位，无能为力也。空谈，也只是聊尽知识分子的责任而已！

在十几年的美育大梦之中，我也做了几件可以一提的事情，特别是在宗教博物馆倡导的生命教育。对于关心我的朋友，以增编的方式，向他们做一个简略的报告也未尝不可。这两年来，我的身体显著地衰老了。我向来体弱，青年时期的肺病虽已钙化，但进入老年，功能急速衰退，大约活不了多久。如果天假以年，再活些日子，也只能在家看年轻人表演了。

很感谢出版社的朋友们给我机会，为我的回忆录画上一个美好的句点。

汉宝德于 2012 年

前言 纸上谈兵

我是 2000 年初离开公职的。回到台北，几乎立刻到登琨艳为我准备的办公室上班。小小的一个房间，一张干净的书桌，面对大玻璃墙外的小院落，新植的荷花只有叶子浮在水面上。我坐着一张自大陆买来的高背古椅，心里有些茫然。退休而寻找自己的新天地是我近来的梦想。然而真正退下来了，如何利用我所剩余的生命，却要费一番心思了。我曾经说要过得有情有味，可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就难了。

首先要摆脱掉俗务。

第一件要摆脱的是汉光建筑师事务所。我是学建筑出身，当然应该以建筑创作为一生事业。诚然，在我担任东海教职的时候，在授课之余，我将大部分心力放在建筑上。可是在我被邀去中兴大学之后，由于十分不合理而且非常落伍的规定，教授不可以执业，我只好把事务所交由二弟负责。好在汉光已有坚强的班底，我以顾问身份指导，已可做出很像样的作品。我的二弟，汉寅德，原是海洋学院的教授，牺牲了教职为我经营事务所。我自公职退休，他坚持把事务所的经营还我。我不愿勉强他，但却已对建筑业务完全失掉兴趣了。

建筑是活的

照一般的看法，离开公职回到建筑是很自然而且顺理成章的事。但是经过这么多年的观察，我对建筑实务已经失掉兴趣。我是自两点观察建筑的。

我学建筑的时候，现代建筑正在高峰。新建筑虽然以现代科技为手段，但在现代大师们的内心深处都有一颗仁心。我们不妨说，不论他的理论如何，作品的外观如何，其最终目的是为人类服务。所以人本的精神是建筑的核心。

我深深体会到，一个态度严肃的建筑家与一个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之间，在精神上并没有很大的差别。我甚至认为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的心情，可以也应该由现代建筑师完成。可是我看到，世界建筑发展到 20 世纪末，这种人文精神完全丧失了。建筑家只在造型上哗众取宠，赢得大师之名，甚至与真正的美感绝缘，其实与耍小丑没有多少分别。我虽大声倡导大乘建筑，当然不会得到回响，因此我觉得建筑不再是令我感到骄傲的行业，不值得再为它伤神了。

另一种体验，是觉得建筑这种行业，要做点事，太靠机缘了。要有非常负责任，而且尊重专业的业主，否则，每一个计划案都是精神上的灾难。我很幸运在中年遇到几位支持我的业主，可是到老年，可以接受我也退休了。即使还有少数在位的，由于制度改变，机关首长不再有权挟自己的判断决定建筑委托，而是改用比图的方式。抬头看去，觉得已没有我的发挥余地。执此业务，如果没有人来主动邀请，就要通过各种关系去巴结业主，这样的建筑即使取得设计权，也不可能发挥自己的理想。另一个办法是参加比图。这是自取其辱。靠几位

不知是何人的委员去判断建筑委托的取舍，而且多半有暗盘，正派的建筑师谁愿去蹚这浑水呢？

不如归去兮

总之，我觉得这已经是年轻人的世界了。

我已经做了我该做的，也许并没有了不起的成就，但却没有再与年轻人抢设计权的必要了。以超然的身份静看他们的表演岂不是一乐？所以我略加思考就决定停止事务所的积极运作，把尚未完成的合约交给跟我工作多年的年轻人去完成，让他们尝尝做老板的甜酸苦辣。

第二件要摆脱的是博物馆计划案。我离开科博馆后，因为该馆的成功，使有些后来的博物馆规划的主管用各种方式希望我伸出援手。我也自以为既然有些经验，与大家分享是理所应当。我帮忙的方式就是接计划案。在台南艺术学院校长任内，我开始以教授身份来接一些案子，在当时觉得是自己的责任。因为年纪较大，身份较高，也受到一定的尊重；我非常高兴把我的建议写成本报告，供他们采行。有一段时间，我担任博物馆学会的理事长，也利用学会来接计划案，觉得是贡献社会的一条途径。

可是我很快就感到当馆长与做计划之间的分别了。

在年轻的时候，对于孙中山先生劝我们“做大事不要做大官”，觉得很钦佩。可是自计划案中我体会到做官才能做事。我本以为以我的经验与资历，去接受任何博物馆的委托，做展示的规划或整体的发展计划，应该会让主管放心。事实却发现权力是一切计划的根本要件。道理很简单，做计划的人只是在做事，心中只想把这件事做好。他是

不是真做得好，那得看他的本领。可是有权力决定要不要实施你的计划的人，却不是那么单纯的动机。他有自己的观点，个人的利益、上司的好恶，要伺候得样样俱到很不容易。

回想我在中年做的几件事情，都是运气，遇到几位授我以权、对我信任的长辈，如今为人做嫁衣裳，人家爱穿不穿，完全不是那回事了。其实我对此情况亦有所感，所以政府官员看得起我，要我帮忙时，我总是希望知道未来负责执行的人是谁，希望这个委托出自这位先生。可惜的是，台湾新博物馆的筹设方式，已经自比较合理的筹备主任制改为先期计划制了。

这，真是荒唐！自此而后，新博物馆筹设就步步维艰了。这等于为人做嫁衣裳，却不知新娘是何人！在先期规划上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到头来，一旦设立机构，一切都要从头来起，所做规划几乎都到字纸篓去了。人生是宝贵的，闲来无事，优游岁月也未尝不可，浪费生命在无益的规划上何为？这是几次痛苦的经验告诉我的。

可是摆脱了这些俗务，能做点什么惬意的事呢？

还是写写文章吧！

笔耕岁月

坦白说，我是靠文章起家的。在骨子里我是一个传统社会的文人，不幸降生在现代世界，所幸现代人仍然保留了一些对文人的尊重。我自做学生起就办杂志写文章，日后到社会上工作，每到一处必办杂志，都是为提供表达意见的园地，即使筹设政府性机构，完成时也开办刊物。在科博馆创办了《博物馆学季刊》，到台南艺术学院，创办了《艺术

观点》。自1972年起，我应邀在报纸写专栏，开始了我的文字生涯。我的一点社会知名度不是因为建筑作品，而是报纸上发表的文字带来的。

开始时，在《中国时报》的“人间”副刊以“也行”的笔名写“门墙外话”。高信疆喜欢我的方块文章，每周刊出两篇以上。第一年就写了上百篇，并出了专集。在那个时候，报纸副刊的影响力是很大的。我的读者很多，只是不知我是谁而已。那时候，我偶尔也在“人间”副刊发表些与建筑有关的散文，想为本业做点推广，有些有地位的长辈对我担任东海大学的建筑系主任不觉得怎样，因在报上看到我的文章，就对我另眼相看。

写了几年，到1979年，《中华日报》副刊的主编蔡文甫邀我为“华副”写每周专栏，用的笔名是女儿的名字“可凡”。这时候为“人间”写稿的量也减到每周一篇。这正是科博馆筹备的初期，写方块已感到一些负担，但仍于海外旅行回台时写些游记，发表在《联合报》副刊。那是我勤写作的岁月。在台中五权西街的小楼上，开始为杂志写专栏，先是为《明道文艺》写建筑的专栏，后来又为《天下杂志》写文化性的专栏，每月一篇，都持续了好几年。

高信疆离开“人间”之后，新人新政，对我的专栏不太热心。这时候，由于我在建筑上为《联合报》王董事长服务，他们就表示希望我不要为《时报》“写得太多”，我就趁此机会停掉“门墙外话”专栏，使很多读者吃了一惊。“联副”的主编痾弦也是老朋友，立刻就约我为“联副”写。我觉得不好。这样似乎我与《时报》闹翻，而事实并非如此。余纪忠先生也是很爱护我的，还曾邀我担任主笔呢！所以我停笔一年多，才接受“联副”的邀约，仍用“也行”的笔名写“绳墨集”，一直写到报纸停止方块文章的世纪结束。

可是，这么多年，我在报端写方块与专论，在杂志写专栏，究竟写了些什么呢？

文化落后阻碍进步

我原是写建筑理论文字的，然而很快地发现，建筑的实务是工程，其精神价值是人文现象，不了解文化，无法参透建筑的本质。从事建筑以来，感觉到文化的因素决定了一切，因此就养成对行为观察的习惯。一旦提笔写专栏，就自然以文化为主题了。

我是现代主义的信徒，相信国家与民族要进步，要与先进国家一样的富强，成为一等的文明国家。我也是民族主义者，认为古老的文化是应该保存而且要发扬光大。与大部分知识分子一样，都面对民族落后的现实与光辉文化的过去之间的矛盾，而不得其解。我自建筑实务的体验中得到一个结论，那就是光辉灿烂的文化成果，与落后的民族行为文化是两回事。我们要保存的是成果，改革的是行为。传统建筑之美使我陶醉，但在台湾，每栋新建筑都有漏水的问题，这不是建筑业的问题，是今人生命态度的问题。啊，问题可大了！

抱着这样的心情写文章，不免是批评的，是检讨的。我希望能提醒大家，我们的民族性有一些基本的文化问题已成为我们进步的障碍。日本接触西洋文化较晚，却能在短短数十年间变成现代工业化强国，是什么原因？一个建筑教授写这样文章能对国家社会产生什么影响？只是吐郁闷之气而已。这一段时期，大约五六年间，以各种方式发表的谬论，蒙《天下》的朋友们不弃，先后出版了两本书，一本是1986年的小册子《生活的触击》，一本是十几年后出版的《不耐平凡》。后